



著

中国文化史新论

—关于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化

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化史新论

——关于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化

何 新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哈尔滨

1122002

责任编辑：贺铭华

封面设计：徐小丽

中国文化史新论

Zhongguo Wenhua Shi Xinlun

何 新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鹤岗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5 10/18·插页2·字数103,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511

统一书号：7093·1025

定价：1.20元

文化研究与中国现代化

——代 前 言

中国现代化的根本课题，是完成社会文化形态的全面更新。

近年来，理论界出现“文化研究热”不是偶然的，这实际是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种总体性反思。十九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华民族先是被动地进入了一个寻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以后又相继发起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等从经济、政治到法制、国体和政体的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这些运动的目标，都是试图在中国的土壤上，移植文艺复兴以后产生的新型近代文明。但是这些运动相继失败了。直到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才逐渐意识到，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文化与社会全面改造。因此，“五四”前后出现了对传统文化作总体反思的第一次文化热。这一反思的结果，是孔教迷信的破除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而为新中国的建立准备了条件。但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尽管新中国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现代化这一目标却至今远未实现。其间还发生了一次历史性浩劫，从中更暴露出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价值观方面存在着大量“前现代”的因素。而就国民生产人均值来说，即使在2000年前后达到人均产值八百到一千美元的目标，离那时的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差距仍甚远。而且单纯的经济成长，与构成一种现代形态的文明，其涵义也绝非完全相同。

实际上，我们民族是在本世纪的后半叶，再一次沉痛地意识到了传统文化形态的落后，因而自十九世纪以来又一次提出了必须实现现代化这一课题。而这的确可能将是一个需要中国几代人，再奋斗一百年以上的艰巨历史进程。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发动的社会主义改革，已揭开了这一新历史进程的序幕。随着当前经济改革的深入，理论界对当代改革的思考也在不断地深化，“改革是一场革命”！人们终于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必然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作全面革新。当前改革所遇到的旧习惯、旧价值观和旧意识形态的阻力，更表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性和迫切性。所以当前的文化研究热，既是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纵深发展，也是上述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文化战略的研究，实质就是对中国当代改革和现代化问题的一个宏观的总体性思考。

从概念上看，社会的现代化有多种含义。目前

世界上对现代化的解释可区分为古典含义和现代含义两种。在古典的意义上，现代化至少意味着三点：（1）政治管理体制走向“合理化”（韦伯的观点），即由“前现代化”的人治政治转变到具有健全法制和高度民主的体制。（2）在产业类型上，通过非动物性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工业革命，过渡为高效率、高增长的近代产业类型。（3）在意识形态上，由超经验的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变为承认理性自由并且建立与技术理论和实证知识密切结合的新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因此，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通常所说的“现代化”，如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法制的健全、社会政治的民主化、思想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等等，都尚只是古典意义的现代化目标，实际上只是**近代化**。当上述三大课题解决以后，我们才真正面对由工业社会过渡到信息化的“后工业”文明（即真正的“现代化”）的问题。从现代社会学的观点看，工业化与经济成长等，只是现代化这一大课题的一个侧面，而远不是全部。从各国的历史经验看，走向现代化的过程，都不可能不是一个牵涉面极其广泛深刻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全面革新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动变过程，其间甚至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局部的冲突和震荡。因此，研究与文化现代化有关的理论问题，对当代中国人文学者来说，已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实际课题。

本书就是为探索这一课题而试写的。实际上，目前的文化研究本身同时也是一种塑造新文化的历史实践。当我们希望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传统时，我们首先应当在反省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坚持科学精神。反省和批评我们的文化传统，同时也的确意味着：“思维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反省我们的传统反省方式，批评我们的传统的批评方式。”

我希望这本书，将能使读者得到这样一个信念：

中国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富裕、繁荣、民主与开放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中国文化最灿烂的形态，是在将来，而不是在过去。

何 新

1986年11月20日于京西古城寓中

目 录

序言

DA46/03

上篇 关于文化学理论的基本观念与方法

- 一、文化反省的当代意义…………… 1
- 二、所谓“文化”究竟是什么……………13
- 三、文化是一种社会性的实体
形态……………16
- 四、文化研究的科学意义……………17
- 五、价值与文化……………26
- 六、价值预设与人类行为……………29
- 七、价值决定文化……………32
- 八、历史理论中机械决定论的
错误……………36
- 九、价值多元和文化相对理论……………40
- 十、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46

下篇 中国文化新论

- 一、以反省的态度重新认识中国
文化……………62
- 二、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72
- 三、氏族组织与中国的家族文化……………76
- 四、四合院与封闭式社会结构……………80
- 五、氏族组织在西方早已解体……………85
- 六、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以家族
制度为模型……………89
- 七、宗法制与中国的传统礼制的
实质……………95
- 八、封建制度的本来意义……………101
- 九、传统中国社会中的身份
制度……………104
- 十、西方的社会契约和自然法
观念……………109
- 十一、中国传统法律精神与西方
法律精神的比较……………114
- 十二、中国古代法建立在刑法
观念上……………116
- 十三、韦伯的权威类型论……………119
- 十四、中国与西方价值伦理的
差异……………124
- 十五、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价值

差异的两个事例·····	131
十六、为什么血缘社会组织在 希腊很早就打破了·····	143
十七、地理生态环境与古代中国 社会的关系·····	146
十八、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三大 阻力·····	153
附录：中西学术差异：一个比较文化史研 究的尝试·····	157

上 篇

关于文化学理论的基本观念与方法

一、文化反省的当代意义

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出现文化热，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文化讨论从历史来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距今已有六十多年了。如果从历史时代看，这两次文化热表面上有许多不同点。但是从这两次文化讨论的中心看，则又有一些共同点：第一，都是围绕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和再认识。第二，又都是围绕着对待西方文化的评价和再认识。第三，这两次文化思考，都导源于一个共同的历史主题，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如何现代化的问题。

出现这种共同点，不是偶然的。从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所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现代化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却不是我们民族自发的，而是在受到来自外部的巨大挑战之下，所作

的一种回应。

十九世纪中叶的魏源在所著《海国图志》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制夷而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这代表了当时主张学习西方者的一般心态。为了民族生存，必当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由此而发起了洋务运动，即引入西方技术和工业的运动，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最初一步。

但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这种学习是既不自觉、又不情愿、更不彻底的。西方物质文明为优，中国精神文明第一，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目标，只是“船坚炮利”、“富国强兵”。因此所引入的西学，自然首先是工艺科技，即所谓“国防文化”。很少有人认识到近代科技乃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而对西方文化中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我们是基本采取抵制、蔑视以至仇视的态度。因此，中国人从洋务运动以来，现代化的目标始终是在必须保持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前提下提出的。这一思想，集中概括为张之洞的八个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我们拒绝改变自己的一系列制度、风俗、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这方面一百多年来的每一步变化都是被形势所逼迫的，是极不自愿的，因此也是非常痛苦的。这种发展取向的偏差，使得中国现代化的成效远不及近邻日本的明治革新运动。

世界上对现代化的解释可区分为古典含义和现代含义两种。在古典的意义上，现代化至少意味着三点：（1）政治管理体制走向“合理化”（韦伯的观点），即由“前现代化”的人治政治转变到具有健全法制和高尚民主的体制。（2）在产业类型上，通过非动物性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工业革命，过渡为高效率、高增长的近代产业类型。（3）在意识形态上，由超经验的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变为承认理性自由并且建立与技术理论和实证知识密切结合的新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因此，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通常所说的“现代化”，如经济成长目标的实现、法制的健全、社会政治的民主化、思想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等等，都尚只是古典意义的现代化目标，实际上只是近代化。当上述三大课题解决以后，我们才真正面对由工业社会过渡到信息化的“后工业”文明（即真正的“现代化”）的问题。从现代社会学的观点看，工业化与经济成长等，只是现代化这一大课题的一个侧面，而远不是全部。从各国的历史经验看，走向现代化的过程，都不可能不是一个牵涉面极其广泛深刻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全面革新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动变过程，其间甚至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局部的冲突和震荡。因此，研究与文化现代化有关的理论问题，对当代中国人文学者来说，已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实际课题。

这种地理中心观念实际上又不仅是一种地理观念，也是一种文化中心观念。就是说，认为我们中国所处的这块土地，认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民族文化，是处在天下大地的中心位置，“众星环绕，若斗之拱极焉”。

环绕着我们的那些非华夏民族，非华夏文化，古人称他们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蛮夷狄戎，这些字眼中，大家可以看到，其中两个字，蛮从虫，狄从犬。而戎古称“犬戎”，夷，古人说：“夷者群居无礼义。”又夷与尾古代实际是同一个字（尾古音作yǐ）。因为东夷之人留辫子，象有尾巴似的。总之，这四个字在汉语中都是一种轻蔑性的贱称。我们认为这些非华夏人在文化上是远远不能与华夏共论的。

战国末期，北方的赵武灵王要学习胡人的骑兵技术，提出采用胡人的短服穿戴——“胡服骑射”。结果遭到严重的反对。他的叔父对他说：“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也就是说，中国是天下文明的中心，是蛮夷学习的目标，我们怎么能反过来学习蛮夷的风俗呢？这种文化中心的心态，三千年一以贯之。

最有趣的是，明末清初之际，欧洲传教士带着新的世界地理观念航海来到中国。他们告诉中国人，我们过去那种自居天下中心的地理观念是错误

的。但这种说法立刻受到正统思想的严厉反对。清初有一个官僚曾专门编了一本名叫《圣朝破邪集》的书。书中针对西方地图中的地理观念说：“中国当居正中，而置偏西，……其肆谈无忌若此！”作者在这里愤慨地把一个地理问题转变为一个政治问题和价值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祖先过去会持有这样一种奇特荒谬的地理观念呢？这一方面与中国所居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的。这一点我们后面再细讲。而另一方面，这与中国过去几千年中所处的封闭性文化环境，也具有深刻的关系。

自秦汉以来直到明清，虽然我们民族遇到过多个在武力上比华夏强悍的游牧民族，但在文化形态上，却从来没有遇到过比我们先进、比我们水平高的对手。也就是说，华夏文化在几千年里，是在一种虽然不断有异族落后文化的冲击，却没有遭到先进文化挑战和与之对话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中国历史上的外交，实际上主要是和周围那些比我们落后的游牧民族、或落后于我们的农业民族打交道。因此我们习惯于采取以大国自居，招抚或绥靖远夷、接受贡纳的不平等外交方式。清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遣历史上第一个外交使团入华。清廷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此事的历史性意义，而把这仍然是看作来自远方蛮夷的“进贡”。在乾隆回复英王的文告中，有这么两段话：“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具见尔国王慕顺之诚，深为嘉许。”

“天朝威德远被，万国来仪。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由此即可看出，当时中国人的大国主义和自我中心观念是何等严重。

即使对那些武力强于中国的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吐蕃、女真、蒙古，我们也仍然具有一种文化心理上的优势地位。

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种文化心理的优势地位，是我们爱国主义观念来源之一。我们虽然国家沦亡于外族，但我们在文化上却不可能接受这些外来民族的影响。我们不能放弃我们优越的文化价值。相反，倒是那些在武力和政治上征服了我们的游牧民族，不得不在文化上向我们认同，向我们学习，采用华夏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

“臣闻以夷变夏者，未闻以夏变夷者”（即由蛮夷同化于华夏，而非由华夏同化于蛮夷）。这显示了华夏古代文化具有一种巨大的容纳吞吐的力量，即现代文化学所谓“涵化”力。

在历史上，我们只在汉晋以后至隋唐的几百年中，向印度学习过他们的宗教哲学。但印度文化，却不是一种能与古代华夏文明相抗衡的强大文明系统。印度从整个历史看，到英国把它统一起来以前，它多半时期是在政治、宗教上处于分裂状态的许多小邦。武力也不强大。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农业文明，在形态上并不比中国先进。所以我们从印度人那里学习过佛教、艺

术和一些哲学思想，但在文化上，总的来看，它并不成为我们的对手。

直到1840年以前，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一种封闭、自足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心态下发展的。由此形成了中国人在文化上一种根深蒂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这种观念直到文化革命中，又一次以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形式重现过。

从好的方面来说，这固然是中国人对中华文化自信、自尊和自豪感的来源；从坏的方面说，那种封闭的心态，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实际上也是几千年文化封闭、隔绝而形成的一个顽症。

到了1840年，中国文化突然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就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列强。当这些西方人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刚开始和中国人通商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很看不起他们的。明清皇帝，特别是清朝，仍然用过去看待那些文化比我们落后的蛮夷的眼光看待这些西洋人。尽管早在18世纪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西洋人在工业上、技术上、科学知识上，有好多比我们先进的东西（如明末的徐光启，他对这一点印象相当深刻。清康熙皇帝也对西洋的技术、自然、科学和艺术有兴趣。他甚至请了几位洋人传教士做顾问和老师）。但是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具有强大的自信心。我们不认为有必要向西方学习什么东西。社会上大多数人，甚至对于西方文化表示强烈的排斥